

那次被捕后的一些经历

这里记述一些 87 年至 89 年学运开始前的一些经历，后来都与八九学运有些关系。

谭飞的忧郁

获释回校后的第二天下午，我们六七个“难友”一齐到校长办公室呈交请愿书。办公室的人表示愿意转交，又打官腔说不保证结果，此事后来便无下文。党员最积极，看来洗刷清白对她非同小可。

六个环境所同学中，我的老乡谭飞很忧郁，大家都去宽慰他。我说，关键是这个行动不是他自己选择的。心中的想法似乎被我说中了，他后来对我很信任。他的恐惧很正常，参加学运会影响到以后的分配，而他们被捕却并非因为主动加入了运动。另一张阴郁的脸也令我印象深刻。那是法律系的一个女研究生，见我们几个“难友”的热情，既流露出一丝羡慕，又忧郁地摇摇头：「你们很有热情，但现实却是……我们去过法院实习，中国的事很难说啊……」她语焉不详地讲起一些在法院实习时遇到的黑暗现象，眼中充满“中国的事情你们还根本不瞭解”那种神情。

隔壁同学的自杀

第二天晚上从图书馆回宿舍，走近楼时发现一辆警车停在近处，吓得我躲一旁偷偷观察动静。起初以为是公安局来抓我了，仔细一想又觉得没道理：下午到校长办公室时，还说不处理我们呢。在楼外徘徊了半小时，最后鼓足了勇气，蹑手蹑脚地闪进单元门，快步上楼，小心翼翼打开房门侧身进屋，这才嘘了一口气。

原来，是隔壁的一个同学跳楼自杀了！

同屋讲起如何抬遗体到医院；隔壁则讲这同学平日沉默寡言，极少言笑，半年前才从清华考来北大计算机系读研究生。此前大家已发现他不正常，有一次是在五道口的铁轨上把他找回来的，看来寻死的念头由来已久，据说可能是因为失恋。¹

此事虽与我无干，却也让我感到沮丧与不解。我向来不认同自杀，无论落到何种地步，人生都可从新开始；如果真是上帝造了人，肯定也不会允许人自己结束生命。我们的人生才刚开始，因此隔壁同学的自杀，给了我极大的冲击。

与柴玲的第一次长谈

政府的狡猾，我的种种观察与感受，事后我很想讲给人听，作为大家日后的参考。真正从头到尾饶有兴味听我讲的只有一个人，她就是柴玲。她本是我同系低一级的学生，这时已转到了心理系，这时正忙着准备考研，我们站在图书馆大楼的走廊上聊了二个小时。柴玲也告诉我许多有趣的事。那天几千同学游行，她与几个拦了一辆公共汽车。「司机真好。中途停车是违规的，但见是学生，一挥手就让我们上了。」一个同学徒步走到天安门又走回来，到宿舍发现鞋底已经没了。这是我们第一次长谈，但并不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起点，那是几个月后的事了。

元月5日，北大同学不满北京市颁布限制游行的《十条》和歪曲报道，聚众焚烧了《北京日报》。【见插图2】

胡耀邦下台

一月底，在寒假回家的火车上，听到新闻联播“胡耀邦辞职”的消息。这时我才明白，原来中共总书记胡耀邦竟同情学运。我觉得他只是个替罪羊，觉得他很冤枉。后来听说他对于撤消总书记一职，只说了一句“能理解党中央的决定”，但这个“党中央”其实是几个八十岁的老朽。八九年撤消赵紫阳总书记一职的，又是这几个老朽。

¹ 我至今也不清楚這位同學自殺的真正原因。另一位北大學生的自殺後來引起很大的關注——北大法律系畢業的詩人海子。1989年3月26日他在河北山海關臥軌自殺。他們的自殺表明80年代後期學生和知識分子的悲觀情緒。海子是“北大四才子”之一，另外三人是：駱一禾，89年▪食時死亡，本書後面會提到；老木，89學運後期廣場宣傳部長，“六四”後流亡巴黎，精神出現問題；90年代我在巴黎見到整理出版《海子詩集》的西川，依然堅守著詩的天地。

与父母的争议

还未到家，学校已先寄来一封铅字红头信，希望父母管教好在大学的儿女云云。父母一见慌了一阵，后来觉得这铅印的东西所有家长都应该收到，才安下心来。不久，父母不知从何得知了我参加游行被捕的事，于是有天晚上，他们要与我单独谈话。

谈话的前半段很困难。父亲沉默良久才开口，绕着圈子问我对报纸上说的“学生闹事”怎么看。我说报纸歪曲了事实，这次我心中有数。难道中央文件也不对吗？我讲了我的见闻，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新思想。中央文件和报纸上的话，以前大跃进、文革中多少谎话，你们不是很清楚吗？为甚么还硬要我接受，况且这次是儿子的亲身经历，你们为甚么不信呢？父亲沉默了。

母亲终于忍不住：你也要为自己的前途想一想，你这样下去，以后怎么办？我们管教不了你，社会就会管教你。看来这才是关键。母亲说话时急切而小心，目光投向地面。我看得出她内心的冲突，她不希望我受苦。父亲虽然默认了母亲的说法，却不愿意像母亲这样露骨地说出真正的担忧，而是继续用报纸中的说法，试图要我相信党永远正确“即使有错也能改正”云云，最后总有一句“要不是共产党领导，怕是你还在地主家放牛呢！”之后，连续三个晚上，我与父亲都有激烈争论。

最后，我不得不缄默。不孝的感觉越来越强——我在动摇父亲的精神支柱，我实在不忍，也实在不能。我感到父亲不是同我辩论，而更像是同他自己辩论。我感到他自己也在怀疑却说不出口。

我的父母

父亲小时候放过牛，后来进了工厂，然后入团、入党，进团校、党校学习，最后还上过北京中央党校。他很想读大学，终究没能如愿。母亲的家境比父亲好，土改时划为富农，但母亲对五十年代的社会风气非常眷恋，常常讲起那时共产党干部的好作风，几人与县委书记一道下乡调研，下饭馆每人只用了八分钱。母亲非常善良，她总是默默地上班，默默地持家。小时候听大哥与其它孩子一块攀比父母，有的说父母作甚么官，有的说他家怎么有钱，大哥想了一会，骄傲地说：我父母从来不吵架！其它孩子一愣，只好甘拜下风。

每次家里做甚么好吃的，母亲总会邀来一位因患糖尿病而生活无望的同事，给他一丝安慰；或是父亲邀来的同事，回顾往日的好时光或惊心动魄的场面。从这饭桌

上，我隐约知道了父母过去的梦，知道了母亲怎样熬了药悄悄地送到牛棚给厂里的干部。有一次，他们悄声议论六零年前后的大饥荒，如何饿死大批大批的人，包括我的一个叔叔和一个叔公。他们发现我在旁边偷听，吓得赶紧要我保证不能对外讲。

文革前父亲是厂里的车间书记，文革中就成了保皇派。一次武斗中，造反派在军队支持下包围了城市，轻易打败了保皇派。那天父亲躲进锅炉房，最后一个被搜出，与其它保皇派一起游街时，险些被一根钢焊刺死。若不是穿着雨衣，钢焊没找准地方，一定就刺进肝脏了，至今父亲腰上还有伤疤。被拉去游街时，十几斤重的厚木牌用根细铁丝挂在脖子上，木牌上写着“走资派的小爬虫”。有时还要到街上摆张桌子，陈述自己的罪状。被捉的那天，三十多人关在十几平米的小屋里，只能坐着睡觉，根本无法侧身。其中一位大腿挨了一钢焊刺中股动脉，也不让请医生，当晚就死了。

小时候偷听父亲与同事悄悄聊这些往事，我暗自感谢那件雨衣，没让我一生下来就成为孤儿。我常见父亲在昏暗的灯下写检查，还以为是他工作的一部分。文革后恢复高考，父母非常鼓励已上山下乡一年的大哥回家复习备考。父亲那时的热忱，我很久以后才能理解——这是他当年大学梦的延续。而今，我们三兄弟都是博士，父母很自豪，在厂里也颇受尊敬。

回校差点被开除

寒假很快过去，回校后又出了一件事。我们研究生这时要确定导师，我希望跟随的马老师，她在所里学术最好。她很不高兴我参与学潮，差点不愿指导我。后来我们关系较融洽后，她才向我透露：所务会上差点把我开除。89年学运时马老师则有很大改变。她以前一直相信共产党，五七年被打为右派开除出党，八三年重新入党。她放弃了在美国执教的机会，但中国的现实又令她极度失望。89年她对我说，这几年越来越感到没有希望，心想过一天算一天；现在你们学生起来抗争，我又感到了希望。

马老师透露的内情，让我想起寒假期间听从党员的建议，给所领导写了一篇七大页纸的陈情书，叙述被捕经过，返校后却没人找我提及此事。我本科时管思想工作的老师则四处散布：遥感所快要开除封从德了！——这是我从另一位老师那里听来的。

准备出国与办托福班

我是 86 年秋季保送上研究生的。到 87 年秋，研究生课程很轻松，见研究生会社会实践部招人，我就报名参加了。第一次聚会来了十几人，筹划社会实践活动，去哪里调查什么的，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很热闹。我提议办托福(TOEFL)班，为准备留学的同学培训英，这时却几乎没人响应，可能大家都觉得太难了。

办托福班其实是为我自己，我的留学梦已经十年了。十年前，77 级上大学的大哥差点被选派去日本留学。电报都发到我们厂，全厂一下子轰动起来，所有人见到我都笑眯眯的，很羡慕我们家。但是很快又得到消息，大哥去不成了，名额被某某高官的子女抢走了。这个反差给我印象很深。那时人们都将离开中国当成一件最幸运的事，谁能出国就像要去天堂一般，整个 80 年代也都这样。中国没希望，知识分子在中国更没希望，越来越没希望，这是 80 年代中后期校园内的一种普遍感受。在这种氛围下，出国留学就成了学生的最高出路。整个校园都在学外语，学生一半时间用来学外语。我准备留学美国，这就要考托福。美国好一点的学校都要 550 分，顶尖院校则要 600 分以上，我用旧题试了几次都达不到。另一个困难是考试费，28 美元到黑市得用 240 元人民币，我们两人考得 500 元，相当于研究生半年多的津贴，若要参加托福班，费用就更大了。于是我决心自己来办托福班。

我的提议只有一人赞同，他是生物系 87 级的研究生彭嵘。从此，从租场地到请老师，从选教材到打字印刷，一切联系安排都归我，买磁带收报名费等跑腿杂务则归彭嵘。我的生意经是：最高的酬劳、最高的质量、最高的收费。为保障质量，我用当时教师工资的 20 倍延请老师，主要来自国际关系学院和北外，他们是最好的托福英语培训教员；又租用北大西语系的语音实验室，是第一流的设备。第一期收费标准和外界一样，收到的钱基本上都给老师和租场地了。因为成绩显赫，平均成绩从培训开始的 480 提升到 590，近半学生都过了 600 分。这个成绩外界根本没法比，因此从第二期起，收费标准逐步提高，直至外界的三倍，而每次报名都人满为患。

办了两期利润已经可观，研会和团委开始插手，派了一个女生进来管帐，有一次竟然拿着我们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大宴宾客，跑到高级餐厅去大吃大喝。那些学生官僚冠冕堂皇的说辞让我感到很恶心。不久，我就去找他们做个了断。我提议将当时每期利润的一半也就是几百元交给研究生会和团委，其余我们独立核算。白得这么多钱而不用费事，他们爽快地答应了，和我签订了协议。权责划分清楚后，我们的干

劲更大了，规模也扩大，还多请了一个同学帮手，很快利润就翻了几番，研会和团委只能干瞪眼。我们白手起家从无到有，规模越办越大，业绩越来越好，如果没有“六四”，或许就没有后来的“新东方”了。

这样一来，我不仅赚到不少钱足够交考试费，还免费学了很多期，结果在 89 年 1 月我的托福考了 633 分，比我的英文老师都高。当然那个分数是虚的，其中有 20 分是因为语法满分而加的分，而我的听力直到现在都很差。托福成绩高，后来自然就得到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提供 5 年博士生全额奖学金的录取通知书。【见插图 3】

在这期间，我和柴玲于 88 年 5 月 20 日领结婚证，22 日请了我大哥大嫂和几位要好同学办了一桌酒席，算是婚宴了。这一年，我还完成了另两件大事：找到一份计算器公司的工作，四通旗下的一家公司；考取了北京市首届“高级程序员”资格证书。【见插图 4】

88 年行动委员会

88 年 6 月初发生了柴庆丰事件——北大研究生柴庆丰被流氓用铁锹和气枪打死，同学们聚在三角地反复播放哀乐、集会讲演。我也站起来讲了几句，当时的气氛有些紧张，很快人群就散了。我感觉不对，想再说甚么，地球物理系一个青年教师将我拉开，叫我和柴玲去 22 楼他的宿舍去喝口水。他其实是怕我吃亏，所以将我拉开，那里便衣很多。

这天晚上，我们一群人诡秘地聚在 43 楼后面的小树林。这就是“行动委员会”。子夜前后，月明星稀，气氛紧张而神秘。会上讨论了一些行动方案，但我一直坚持应该公开活动，我坚信秘密行动既无效又会带来不必要的危险。我的想法可能超出了大家能接受的范围，许多人不赞同公开，或许以为秘密活动尚能维持一段时间，一旦公开，则必受当局重创。于是我就退出了。²

² 89 年北大籌委會中的熊焱、王有才、邵江和沈彤等人也參加了 88 年的行動委員會，另外還有武運學、馬學禮、楊通學、劉剛（87 年夏已畢業），起的作用應該較大。邵江說行動委員會持續了大約 10 天，以張貼公告、各系串聯、在其他高校張貼大字報、講演、開會等方式組織學運，後來因為成員受到官方的警告和壓

力，這次學潮以 6 月 17 日的廣場散步為結束，之後行動委員會成員受到不同程度的清查。王有才記得沈彤起初並不積極，後來行動委員會成員受清查時，沈彤變得很活躍，四處打聽某日某次會議某人是哪個系的叫甚麼名字。沈彤 90 年的自傳提到熊焱和我與他如何相識，但我們都不記得。我對沈彤的第一印象是在 89 年 4 月 20 日凌晨那一幕，參見那日的記述。